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1卷 / 丛书主编 王一川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中国现代文论传统

王一川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1卷 / 丛书主编 王一川

中国现代文论传统

王一川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论史·第一卷，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王一川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
ISBN 978-7-303-21141-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915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ZHONGGUO XIANDAI WENLUNSHI: DIYIJUAN ZHONGGUO
XIANDAI WENLUN CHUANTO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5

字 数：335 千字

版 次：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38.00 元

策划编辑：王则灵

责任编辑：李洪波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段立超 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总 序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曾先后出现过林林总总的新的文学观念、思想或思潮——它们在这里被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简称中国现代文论。这些被视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东西与同时期同样新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现代文学作品一道，通过影响诸种不同读者的心灵，而在现代社会革命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现代社会革命进程有力的推动力量。对这样的中国现代文论展开追溯、论析和评价，当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今天从事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当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已出现过若干种，而它们已从各自不同角度向人们重新打开中国现代文论历程中的多样景致时，现在再来着手编撰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是否有必要？确实，现在来编撰一部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起码前提就在于，必须确保能在中国现代文论史观上或多或少地呈现新东西，至少是有所出新。如此，在文论史观上出新就应是我们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的唯一选择。但是，要在前人和时贤业已倾力创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领域另觅新径，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勉力为之。

一

中国现代文论，也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这里大约是指相互交融而难以分割的四个层面的东西：第一层面是指那些明确表述出来的文学思想或理论，例如梁启超倡导的“诗

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三大文学革命主张；第二层面是指在一定的文艺共同体（由一定数量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组成）内外标举或响应的那些相互关联的诸种文学思潮，例如，五四时期的“为人生而艺术”潮流、后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第三层面是指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论著中表述或蕴含的相关文艺或美学观念，例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有关艺术的论述；第四层面是指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或显或隐的文学观念、艺术观念或美学主张等，例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对湘西边远山乡中纯美情感的追求及其所呈现的深层文学与美学观念。这些层面的文学思想、思潮及观念共同编织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声部交响曲。

相对而言，本书固然会主要讨论上述第一、第二层面的文学理论，但在需要时也会对第三、第四层面有所涉及。

二

中国现代文论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包含若干长时段的超长时段连续体。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为第一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Ⅰ时段，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称为现代Ⅱ时段。本书将主要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至于现代Ⅱ时段状况，则应另行研究。

就具体的时段或时间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论域由三个时段组成：直接的主要论述时期现代Ⅰ时段称为主时段，与此时段存在关联的那些时段为关联时段，而有所延伸的时段为延伸时段。中国现代文论史的主时段为1899年“诗界革命论”（梁启超）提出至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前；其关联时段为鸦片战争至庚子事变；其延伸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过，现代Ⅰ时段本身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个中时段：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为现代Ⅰ时段前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现代Ⅰ时段后期。这里将把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前期状况作为直接论述对象，但同时也会适当涉及关联时段和延伸时段。

三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现代文论史是中国我者（或自我）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涵濡，是一个中国词语。涵是指包容或包涵，即把外来的東西包容进自身躯体之中；也指沉或潜，即把外来者不仅包容进来，而且还能沉入自身躯体之中，直到潜入最基础的底层。濡则有沾湿或润泽、停留或迟滞及含忍之意。合起来看，涵濡的基本意思在于雨水对事物的包涵和滋润状态。可见，涵濡带有包涵和滋润之意，以及更持久而深入的濡染、熏陶或熏染之意。它可以同现代人类学的“濡化”（acculturation）概念形成中西思想的相互发明之势，共同把握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在20世纪实际经历的相互润泽情形。

应当看到，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各自的身份及内涵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段有其不同的呈现方式以及关系状况，正是这种身份及内涵变化会影响到现代文论本身的发展和演变。

同时，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语境本身也是变化的，正是这种社会语境变化会对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的关系状况及其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

由此，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涵濡会导致中国我者发生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我者既不同于其原有状况，也不是西方他者的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一种自身前所未有、西方他者也从未有过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现代文论。

正是在如上意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是现代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产物。在中国现代文论界曾先后登上主流地位的“典型”与“意境”范畴，正是一对平常而又重要的范畴实例。应当讲，来自西方的“典型”范畴在西方20世纪文论界本身并没有像在中国现代

这样主流过(尽管曾经在苏联文论中主流过);同样,来自中国古代的“意境”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界本身也没有像在中国现代这样主流过(尽管明清时代曾有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能盛行于中国现代文论界,恰恰应当归结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或濡化,也属于这两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就“典型”来说,中国古代以金圣叹小说评点为代表的人物性格理论,已为西方“典型”范畴在中国的涵濡准备了合适的土壤、气候等文化条件,而亟需拯救的中国现代文化危机则成为“典型”登上中国现代文论主流宝座的有力推手。而来自西方的以尼采的“醉境”(或酒神状态)与“梦境”(或日神状态)等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以及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等为代表的哲学及文化理论,也为中国古代“意境”(或“境界”)理论在现代的复兴及大放异彩提供了强烈的比较发明诱因。尽管在论者因不满足于“典型”的独尊地位而倡导将“意境”作为与之平行的美学范畴提出之初(1957),“意境”概念并没有立即在中国热起来,但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深化,“意境”作为中国文化与艺术在全球化时代当然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标志,而逐渐与“典型”一道成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①,乃至后来逐渐成为取代“典型”范畴而一枝独秀的美学范畴。由此看来,无论是人们已经论及的“典型”还是“意境”范畴,或者本书提出的“感兴”范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或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恰是由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文化涵濡的缘故。如此,要想弄清中国现代文论这对重要范畴的兴衰,假如不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去把握(当然也应当同时从其他方面去把握),想必是难以全面完成的。

^① 李泽厚:《“意境”杂谈》,《光明日报》“文化遗产”,1957年6月9日、16日,据李泽厚:《门外集》,138—13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四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属于笔者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 200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在结项后的一项延伸和扩展性成果，共由四卷组成，依次由笔者与陈雪虎、胡疆锋、胡继华协力承担。在与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众多同行朋友协力完成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之后，我们再集中大约七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四卷本著作的撰写工作。如此，这部著作的研究、写作及修改过程不知不觉中竟然已前后历时十多年。

这四卷除了第一卷为总论外，其余三卷都大体按照时间进程的推移或交替去安排，第二卷主要停留于清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第三卷聚焦于民国初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第四卷着眼于五四时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不过，与此同时，包括第一卷在内各卷的主要议题或任务诚然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之间又都存在复杂的关联性及其持续的缠绕，因而相互之间呈现交叉、回溯、照应或打通等态势，又实在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只有这种分工的相对性和交融互通的密切度，才更有利于进入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进程之中。因此，当有的人物、事件、观念、命题或案例在各卷中数度重复出现或交叉，甚至被赋予不同的阐释任务时，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第一卷为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这属于全书的总论部分，概要地阐述中国现代文论若干方面的特征，由本人撰写。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不是来自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着自身的现代性缘由。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被视为“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持续的层累涵濡进程的产物。置身在持续的层累涵濡过程中的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这导致异质他者总是不断地被涵濡进自我的机体中，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可以由其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其位移、我他关系模型及双重品格得到呈现。在心化美学与物化美学的对照及兴辞美学方案中，可见出中国现代美学Ⅰ时段与现代美学Ⅱ时段的分化与联系。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特点还可从与中国现代型文学传统的特征及其大海形象个案的比较中见出。

第二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探究清末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轨迹，由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撰写。需要暂且搁置我们后人想当然的清晰概括，重返当时的文论发生现场（假如有的话），尽力窥见其时本来就有的多元选择中的困惑与执着、拒绝与对话、冲突与调和等不同面貌。从知名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等以及未必知名的朱希祖等人物的选择可见，中国现代文论从其发生赋形时段起就呈现为多元取向中的张力式构造及历时与共时交互缠绕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其顽强守护中国我者固有传统的方略，还是其果敢拿来西方他者的精心筹划，都呈现出多重方案或多种可能性，以及逐渐演变或寻找的复杂性。通过尽可能多地检视不同的不同陈述、查阅新近研究成果、引证时贤多种不同的论说，多方面地贴近中国现代文论发生期的内在的张力面貌和多重选择的困窘，构成该卷的自觉追求和特色。

第三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如何以多层次的体制化方式进一步形塑自身的生存方式并发生演变，该卷由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撰写。该卷的新意在于走出过去单一的思想辨析路径，尝试从学术体制与文论思想之间的关联性视角，也就是从知识制度的大众传媒、现代大学、文学社团、政党文艺政策的综合与交融视角，具体勾勒中国现代文论尽可能完整的制度化转型面貌及其具体的生成与演变轨迹，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多层次之间的交汇以及历时与共时之间的交融图景。正是借助于这种综合与交融视角，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分析，该卷揭示了中国现代文论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制度化转型状况，表明假如离开这种多层次制度转型，中国现代文论那些已经呈现或尚未完整地呈现的特质就是不可思议的或难以理解的。

第四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分析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文化涵濡与多元文论思想秩序，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撰写。该卷选取精神史与文化涵濡的视角，从纷纭繁复的现代文论观念、命题或思潮中，尽力梳理出几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或文艺思想，看看现代耳熟能详的或者暂且被遗忘的那些文艺思想，是如何在当时以自身面貌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和象征主义正体现出其时的多元思想景观。甚至其中的象征主义思潮内部，还可细分出诸如梁宗岱的象征诗学、李长之的理想人格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心灵”、冯至的浪漫主义、闻一多的古典主义、陈寅恪的史诗互通论和钱钟书的跨文化诗学等不同思想选择。当代人从这些不会被遗忘的多元思想取向及著者自己有关天文与人文汇通和中西诗学互化的构想中，可以得出怎样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四人合作的四卷本著作，除了各卷承担不同的分析任务，而在人物、思想、事件、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他相关现象方面有时会略有重叠或交叉外，各位著者在学术上也各有其学术积累、治学专长和文论主张，因此，虽然彼此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共同努力，但终究还是各有其特殊性或个性显露。这应当说也是合理的，因为笔者所设想的学术合作，不再是消除个别性或差异性的完全同一体，而是带入差异和体现个性的“和而不同”的共同体。不过，在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面貌、主线、分期、制度、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品格等主要问题上，各位著者之间的相互协调立场仍然是接近的，尽管难免仍存有不同。



2019年1月22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导 论 通向中国现代文论传统	1
一、“传统”的古今中西演变	1
二、传统与中国现代文论	9
三、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论述框架	11
第一章 层累涵濡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论的变迁	13
一、涵濡理论	14
二、涵濡中的中国历史景观	20
三、涵濡中的中国文论长时段	25
四、中国现代文论的涵濡方式及其革命性	28
五、中国现代Ⅰ文论的层累涵濡特质及其时段	32
六、生成中的中国现代Ⅱ文论	45
七、层累涵濡的文论现代性	48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方式	
——以“诗界革命”论为个案	50
一、从全球化向东涵濡看“诗界革命”	51
二、王韬：“奇境幻遇”与“地球合一”	53
三、从王韬到黄遵宪	60
四、黄遵宪：“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	62
五、梁启超：新意境、新语句和古风格	67
六、全球化向东涵濡的本土诗学投影	69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建立

——兼论西方文论知识型的转向	71
一、西方文论“知识型”及其转向	72
二、中西文论的相遇方式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	76
三、以中为镜看西方	80
四、中国现代历史视野中的文论知识型	82
五、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革命”背景	83
六、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与“世界学术”	88
七、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内涵和特征	94
八、以曹丕与陈独秀为案例	98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论核心范畴的位移：从典型到感兴

——兼谈兴辞在文学作品的文本层面中的存在	101
一、典型在西方及其向东涵濡踪迹	102
二、典型在中国的兴衰及其启示	111
三、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三层次及其若隐传统	115
四、感兴在现代的若隐若显及其原因	118
五、中西比较中的感兴再生	133
六、感兴论与21世纪中国文论现代性传统建设	141
七、汉语文学的兴辞性	144
八、兴辞在文学作品的文本层面中的存在	152

第五章 中国现代文论中的外来他者 171

一、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	171
二、四次转向的动力与特色	173
三、外国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论走向	179

第六章 中国现代文论的双重品格 183

一、中国现代文论的品格	183
二、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型品格	185
三、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型品格之特征	189
四、未来：从显西隐中到以中化西	197

五、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型品格	199
六、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型品格之特征	200

第七章 心化美学与物化美学之间

——简论中国现代美学Ⅰ与现代美学Ⅱ	208
一、长时段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美学	208
二、中国现代美学Ⅰ：革命年代的心化美学	210
三、现代心化美学的传统渊源	214
四、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长时段	216
五、现代美学Ⅰ与现代美学Ⅱ：从革命年代的心化美学到 改革年代的物化美学	220
六、反物化的物化美学范式：兴辞美学	224

第八章 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文艺美学形态

一、文艺理论美学化的学科之花	231
二、古典诗教传统与现代美学的合力	233
三、学科归属：交错还是特殊	235
四、有限度的自由之花	237

第九章 中国现代文论的新趋势

——兼谈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教育	240
一、“理论之后”的理论	240
二、从文学到文学理论	244
三、“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特征与选择	250
四、文学理论与兴辞化臻美心灵的养成	253
五、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教育问题	255
六、文学教育的现代角色及其当前危机	257
七、重新召唤诗意图灵的幽灵	261

第十章 现代型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

——兼谈大海形象中的现代性问题	266
一、中国文化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	267

二、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性及二者的交叉点	269
三、中国的现代型文学传统	272
四、中国现代型文学与中国现代学	276
五、大海形象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分析《你见过大海》 ..	281
第十一章 当代文学语言状况	310
一、政治整合、语言俗化与大众群言	311
二、思想解放、语言雅化与精英独白	315
三、文化认同、语言多元化与奇语喧哗	319
四、角色认同、语言分合与多语混成	325
五、片语博笑与文学语言新景观	329
结 语	336
一、涵濡中的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	336
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方式中的两种过程及其交融	339
三、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核心范畴、我他关系模型及品格	340
四、中国现代文论的分化与联系	342
五、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与中国现代型文学传统	343
后 记	345

导 论 通向中国现代文论传统

中国现代文论是中国文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切地说，是中国文论传统中与古典性传统有所不同的现代性传统。要了解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就需要对传统、文论传统以及现代性传统本身做出大致的阐明。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表述，是在与中国文论现代性传统这一表述大体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只有当面对不同的问题领域，倘不换用就无法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时，才会有限地换用，但它们说的实际上是一回事。

一、“传统”的古今中西演变

“传统”一词，《词源》没有收录。《汉语大词典》1997年版中有两个主要义项：第一义项“谓帝业、学说等世代相传”，所举例子有《后汉书·东夷传·倭》：“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还有南朝梁沈约《立太子恩诏》：“守器传统，于斯为重。”第二义项则是指“世代相传的具有特点的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社会因素”。这第二义项所举词源来历中，无一例出自古代典籍，都是现代的，如作家孙犁散文集《秀露集》中的《耕堂读书记(一)》：“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宗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该散文写于1980年，集子于198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判断，在词典编撰专家眼中，第二义项应只归属于现代义项，而与古代义项有所不同。《汉语大词典》还指出“传统”也指“世代相传

的，旧有的”，如杨沫《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五章：“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①这里的归纳诚然是准确的，但是实际上，第二义项的词源出处应该更早。

在“传统”概念的第二义项的使用上，梁启超、陈序经和张君劢等是绕不开的重要人物。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思考就已触及现代义项的“传统”问题，尽管他那时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新史学》系列论文，对中国文化传统作了分析和批判。其中的《论正统》一文就对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正统”作了新的考辨。“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②他认为，中国“正统”词义主要是从统治者的“一”统角度去说明的，尊“正统”其实也就是尊“一”统。统治者的“正统”来自两方面，“（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③这就揭示了“正统”的“自私”与“奴性”实质。梁启超转而以“敢翻数千年来之案”的勇气，从“民主宪政”角度去重新伸张“正统”的内涵：“然则正统当于何求？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④在梁启超看来，现代“正统”之实施的立足点不在“君”而在“国”，即要以“国”代“君”；不在“一人”而在“众人”，即要以“众人”代“一人”。可见，那时的梁启超力图抛弃君王一人统治的古代正统制度而建立众人治国的现代民主宪政。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剥露出中国

^①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688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② 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1639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1641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④ 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1643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古代社会中由君臣关系及其礼仪制度构成的“正统”的症候。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这里，“正统”一词存在正面与负面、肯定与否定、褒义与贬义等双重可能性。

在陈序经于 1933 年撰写、1934 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现代义项的“传统”概念及其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但这个词主要还是在否定性意义上被使用的。这位引发激烈争议的“全盘西化”论者，在论证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必要性时就明确指出，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因袭过于深重，阻碍了个性的生成和发展，所以需要“全盘西化”。他甚至直接把“传统”等同于“旧文化”“复古”或“文化停滞”：“复古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而且是中国思想上的一个特点。”^①正是为了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他大力“提倡”来自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文化的停滞，即由于传统思想压迫个性的发展，则提倡个人主义，不但在消极方面，可以打破传统思想；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文化的进步。西洋近代之文化之所以能于二三百年内发展这么快，主要由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提倡。”^②显而易见，其时的陈序经主要是在负面、否定或贬义上使用“传统”一词的，认定必须“打破传统”以寻求“彻底全盘西化”，现代中国文化才有出路。他甚至断言：“可惜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已深入骨髓，结果是轻轻的一针注射的个人主义，敌不住什么堂皇的思想统一的注射……”如此一来，他提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全盘西化”论：“彻底的全盘西洋化，是要彻底的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而给个性以尽量发展其所能的机会。但是要尽量去发展个性的所能，以为改变文化的张本，则我们不得不提倡我们所觉得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的个人主义。”^③尽管是在否定性意义上使用“传统”一词的，但毕竟是在第二义项即现代意义上使用的。

在陈序经对“传统”做了一边倒的否定性运用后，张君劢在 1936 年对什么是中国“传统”则作了较为持平的肯定性解释：“国人在思想上以孔孟之经籍为宗，在政治上有专政帝王，在宗教上有本土之拜祖先与

^①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62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2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③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29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